

刘南平 班秀萍 著

司马相如考释

天津古籍出版社

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

刘南平

班秀萍

著

司马相如考释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司马相如考释 / 刘南平, 班秀萍著.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7. 7

ISBN 978-7-80696-441-5

I. 司… II. ①刘…②班… III. 司马相如(前 179~前 117)—人物研究 IV. 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4528 号

司马相如考释

刘南平 班秀萍/著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http://www.tjabc.net>

E-mail: tjgj@tjabc.net

天津泰宇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625 字数 263000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978-7-80696-441-5

定 价: 18.00 元

绪 论

如果说赋之于汉堪称文学天地的一座高山，那么，司马相如就既是这座高山的奠基人，又是峰巅上的一面旗帜。在他的带动下，人们看到了文学创作的广阔天地，纷纷跃跃欲试，踏进了文学自觉的大门，形成了汉赋创作鼎盛于有汉一代的繁荣局面。虽然日后因为模拟之风日盛而毁了散体大赋的前程，但是，相如的首创之功，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其身后，都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和贡献，赢得了人们深深的敬意和由衷的赞誉。《西京杂记》卷三载：“司马长卿赋，时人皆称典而丽，虽诗人之作，不能加也。扬子云曰：‘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子云学相如为赋而弗逮，故雅服焉。”“长安有庆虬之，亦善为赋。尝为《清思赋》，时人不之贵也，乃托以相如所作，遂大见重于世。”^①班固和刘勰称其为“辞宗”^②；明人王世贞誉其为“赋圣”^③；鲁迅赞其“卓绝汉代”^④，还将他与司马迁并称；今人

① 见中华书局点校本，1985年版第21页。

② 见《汉书》卷一百下《叙传第七十下》，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年版，第4255页；《文心雕龙·风骨》，范文澜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13页。

③ 见《艺苑卮言》卷二：“屈氏之《骚》，《骚》之圣也。长卿之赋，赋之圣也。”。载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976页。

④ 见《汉文学史纲要》《第十篇 司马相如与司马迁》，载《鲁迅全集》十卷本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306页。

则把“两司马”是汉代文坛“双星”的桂冠敬献^①。当我们克服了其赋作中艰深冷僻字的障碍，深入到那“材极富，辞极丽，而运笔极古雅，精神极流动，意极高”^②的赋文当中去的时候，不仅会被“其变幻之极，如沧溟开晦；绚烂之至，如霞锦照灼”^③的“巨丽”美所激荡，更会被熔铸其中的作者的人格美所感染，而由衷地首肯古往今来人们对他的美誉了。

正是司马相如自身拥有的如此魅力，才引起学术研究的多方关注。目前国内研究司马相如的专著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司马相如集”的文献整理，至今国内已见五种^④；第二类是以“评传”体例进行的作家研究，国内现有一种^⑤。一些类似作家研究，但体例上近乎小说的著作笔者没有将他们算在内^⑥。

第一类专著限于文集校注的体例，都以“前言”形式简介作家生平，或加上附录“研究资料”的形式暗示作家研究与作品研究相结合的思路。这些资料包括作家传记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作家逸事辑录、历代题咏等，丰富翔实。李孝中的“校注”和张连科的“笺注”

① 见刘振东著《汉代文坛上的双星——司马相如和司马迁比较试论》，《齐鲁学刊》1989年第3期。韩兆琦著《汉代文章两司马》，《光明日报》1999年5月3日第12版。马予静著《西汉文章两司马——〈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考论》，《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② 见《艺苑卮言》卷二，载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82页。

③ 见《艺苑卮言》卷一，载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62页。

④ 费振刚、仇仲谦译注《司马相如文选译》，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版；金国永校注《司马相如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朱一清、孙以昭校注《司马相如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李孝中校注《司马相如集校注》，成都：巴蜀书社，2000年版；张连科笺注《司马相如集编年笺注》，沈阳：辽海出版社，2003年版。

⑤ 龚克昌、苏瑞隆合著的《司马相如》，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需说明的是，网络上有列入匡亚明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司马相如评传》，经与南京大学出版社核实，该套“丛书”中无此书。故言目前国内有一种“评传”类司马相如研究专著。

⑥ 如冈国本著《司马相如全传：巴蜀大才子》，长春：长春出版社，2000年版。尚永亮、王承丹著《盛世文豪：司马相如传》，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

堪称代表作。受到这些研究成果的启发，笔者意欲寻找到一种较为直接的、能将司马相如的作家研究与作品研究相结合的编撰体例。

这种结合的可能性就一般意义而言，来自文学研究客观存在的世界——作者——作品——读者的“阐释场”；就司马相如其人其作的特殊性而言，有关他生平的文献或奇缺、或语焉不详，而今存完整的赋作品也仅有六篇，加上文字冷僻艰深，司马相如融在其中的心音情韵难以被后世读者轻松地感悟。因此，本书意欲构建一个以作家生平考辨为突破口，以作家人格考论为中枢，以赋作考释为基础，集考、论、释为一体，相辅相成、互为印证的司马相如“阐释场”。

如果说集考、论、释为一体既是一种体例，又反映了一种研究方法的话，那么，本书可以说集合了各种研究方法。其中既有传统的考据学方法、“知人论世”法，又有近现代的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等方法。而这些方法的综合运用与现代系统论方法的接轨尤显重要。系统论的核心思想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整体性、联系性、动态性、有序性、开放性是其方法论的核心。稍有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常识的人都会意识到，系统论似乎与之很接近，其实他们不是一回事^①。不过这种“接近”从一定意义上显示了系统论的科学性。而从事学术研究的第一要义是保证、提升其科学性。

本为自然科学方法论的系统论启示我们意识到，任何人、事、物的每一个细节都势必会形成一个以“自我”为主体的子系统，通过与无数子系统的互动，构成人、事、物作为主体的大系统。就人而言，不到“盖棺”之时，其系统就始终处在整体的、联系的、动态的、有序的、开放的状态之中，一旦生命结束，人生系统的活动就告一段落了。但是，却不能排除他作为研究客体进入后人研究视野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首先取决于“盖棺”之人有无可供研究的物质的或非物质

^① 简而言之，从产生的实践和理论基础，到研究对象、基本理论范畴，乃至在人类知识结构体系中所占的地位、影响，系统论都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

的资料。就物质资料而言，主要指与“盖棺”之人相关的实物考古资料，和出自其亲笔或非亲笔的包括经、史、子、集在内的各种文献。一旦“盖棺”之人进入后人的研究视野，其人生大系统虽依然鲜活，却不能自主这再生系统的真实性。其真实性只能仰赖由后人研究成果构成的续续相生的系统的品质、品位和品格。因为上述物质的或非物质资料都在存留或承传过程中有必不可免的变形，如何还其本来面貌，后人研究的科学性是唯一的保证。

值得庆幸的是，“史圣”司马迁奠定了中国历史典籍的优良传统，他所开创的纪传体以近乎现代系统论的网络式结构，为后人提供了遵循系统论思想和方法进行科学研究的便利条件，笔者从中获益匪浅。

首先，笔者受到史迁“互见法”的启示，把《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当作一个个开放的“图书馆”来用。凡与司马相如同时出现在《史记》《汉书》和《通鉴》中的人物，一个也不放过，一个带一个地、逐个顺藤摸瓜地研读。也就是说，他们都与司马相如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诸如梁孝王、汉景帝、刘濞、枚乘、邹阳、韩安国、汉武帝、董仲舒、公孙弘、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主父偃、徐乐、严安、终军、王褒、贾捐之、东方朔、枚皋、李延年、李夫人、陈皇后、所忠等人的传记、表、书、志等文献，和《史记·封禅书》中有关李少君、少翁、康王后、栾大、公孙卿等人的记载，都为笔者的考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同时发现，《通鉴》虽然是编年体，却并不严守传主初始本传的系年，因此，欲以《通鉴》作考证依据，须慎之又慎，本书第一章有不少例证。

其次，不放过“馆”中任何一笔寓目的相关记载，以近乎数学推导的“小心求证”建立环环相扣的证据链。因为古代史籍体例上原本存在的整体的、联系的、动态的、有序的、开放的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仔细寻找证据链的条件。比如司马相如“约生于公元前 169 年”的考证结论，是与目前影响很大的“公元前 179 年”（或曰“公元前 179

年？”）说，以及“阙疑”说相左的。前者出现在很多重要的工具书中，如《辞源》^①《辞海》^②《中国人名大辞典》^③《中国文学家大辞典》^④《中国历代名人辞典》^⑤《中国古今名人大词典》^⑥等。上述五种司马相如集校注及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⑦亦取此说。一些著名的《中国文学史》，如游国恩等主编的^⑧、章培恒等主编的^⑨、袁行霈主编的^⑩，则以不同方式明示或暗示了对“生年不可考”说的认同。笔者所以得出与学界现有结论相左的结论，就是因为从《汉书》《韩安国传》和《邹阳传》中发现了两笔仅有七个字的至为关键的记载。这就是《韩安国传》中“月余弗得”和《邹阳传》中“行月余”七个字^⑪。就是这七个字，使文献记载之间原本存在的逻辑关联凸现于笔者眼前。而这种逻辑关联显然体现了《汉书》近乎网络式体例的优势。我们的研究不过是尽量充分利用这种体例所提供的关系而已。必须要说明的是，笔者对文献的利用、对司马相如生年的考订有一个预先构建好的研究思路，这是刘开扬、束景南等前辈学者的研究过程给予的。建立在这种预设性研究思路基础上的考证，使笔者对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说多了一些感同身受^⑫。这种方法的有效性正如胡适在《清代学者的治

① 商务印书馆 1983 年 12 月修订第 1 版。

②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0 年版。

③ 臧励和等编，上海：上海书店印行，1980 年版，根据商务印书馆 1921 年版复印。

④ 谭正璧编，上海：上海书店印行，1981 年版，根据光明书局 1934 年版复印。

⑤ 南京大学历史系编写组，江西教育出版社，1982 年版。

⑥ 庄汉新、郭居园编纂，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9 年版。

⑦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 2 版。

⑧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年版。

⑨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

⑩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 1 版。

⑪ 见本书第一章第一节的引用及考辨。

⑫ 胡适先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中说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总括起来，只是两点。

(1) 大胆的假设，(2) 小心的求证”。又在《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中重复了这一表述。分别见《胡适文存》（一集）卷二和（三集）卷二，黄山书社，1996 年版，一集第 298 页、三集第 93 页。

学方法》中所说：“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①而这种方法的实质，又恰如胡适在《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中所说：“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因而他紧接着说：“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②故此可以说，如果没有《韩安国传》和《邹阳传》中这七个字，即使笔者此前有多么严谨的推导，也只能因为司马相如生年考订中有缺环掉链的地方，而遗憾地从“阙疑”说了。这七个字真可谓“四两拨千斤”，充分显示了迂固“互见法”之举足轻重的作用。除此之外，本书第一章的每一笔都是以近乎数学推导的小心求证写出来的，终于一步步走到了足以为司马相如建立年表、再现其人生大系统的目的地^③。

再次，系统论的思维方法启示笔者必须极其关注每一个系统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堪称具有“大于部分之和”意义的子系统，我们可以称这个子系统为“整体”。也就是说，这个子系统虽然也是一个细节，但是它具有从整体上统领、驾驭大系统的地位和作用，是大系统的“灵魂”。问题是怎样发现具有这种意义的子系统？就本书而言，如果说第一章完成了为司马相如填写履历表的任务，是人物研究中具有本质意义的基本功和常规的话，那么，追寻活跃在这份履历表中的灵魂，则可以说是人物研究中更具本质意义的基本功和常规。因而，第二章《司马相如“原始情结”论》在本书中是具有“整体”意义的子系统。何以见得？

就本质属性而言，“原始情结”是一种心理活动，它形成于主体的基本素质，指意识被压抑而持续活动在无意识中，以本能冲动为核心特征的愿望。就能量而言，“原始情结”往往会凝固为人的某种固有的

① 《胡适文存》一集第298页。

② 《胡适文存》三集第93页。

③ 此年表见本书第一章结语部分。

思维模式，潜行在人的情绪、情调、情感 and 情操中，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人的基本生存意向和生存方式，成为人的意识、精神和价值取向的心理基础。当这一切因具有无意识的本能冲动性而成为自然而然的习惯作风时，因具有“持续”性而成为以坚定性和坚韧性为基本特征的意志品质时，人的内心世界最本质的东西就会不经意地表现出来，这是一个连其本人都往往意识不到、控制不了，很自然、很真实的过程。因此，由这种心理活动所积淀的一贯表现，往往使人的灵魂、秉性、人格在无意识中被展示。追寻一个人的“原始情结”，便可追寻到他的灵魂，对他进行切实的价值分析。这种追寻有两个要义必须把握住。

第一，人的“原始情结”形成于一定的文化积淀，因而，追寻人的“原始情结”，本质上就是要探寻、揭示这“原始情结”的文化底蕴及其品质、品位和品格。比如司马相如的“原始情结”是怎样萌生的？它蕴涵着怎样的文化基因？标示其“原始情结”的核心内容是什么？这些都必须通过考论得以确认，否则，我们所认定的研究客体的“原始情结”就称不上是他的“原始情结”，就失去了立论的基础。

第二，人的“原始情结”必然要经历一个由萌生到释放的过程，这个过程必然要受到品质、品位、品格不断变动的环境的影响，因而，人的“原始情结”会不会因为环境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尽相同的表象，如果会，是否有标志性特征而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这些标志性特征是否意味着其“原始情结”的文化基因和核心内容发生过动摇、改变？一般来讲，“原始情结”的持续性特征，会使看似发生变化的表象背后蕴藏着不变的东西，因此，探寻、揭示变化中不变的东西，是追寻人的“原始情结”的重要构成。比如司马相如的心路历程有没有阶段性变化？如果有，这阶段性变化中有没有不变的东西？这也是必须通过考论得以确认的。如果确认不了那个“不变的东西”，我们所认定的研究客体的“原始情结”也称不上是他的“原始情结”，也就失去了立论

的基础。而那个“不变的东西”，本质上就是一个人“原始情结”的核心内容。

笔者所以必须指出这两个要义，一是必须说明追寻人的“原始情结”作为一种学术活动的本质内涵，即以探究人的文化基因及其变化中不变的东西为核心。二是必须说明追寻人的“原始情结”不是目的，不能为了认定而追寻，不能先入为主，事先框定，要完全从事实出发。

那么，怎样才能发现这样的事实呢？笔者以为，司马相如本传作为散文作品的“文眼”，和出自他笔下的汉赋作品的“赋眼”，是很重要的线索，它们堪称“系统”中那个“大于部分之和”的“整体”。比如“慕蔭相如之为人”句堪称司马相如本传的“文眼”，可以说是司马相如“原始情结”的表象。我们的研究就是要探寻这一表象的文化基因及其变化中不变的东西。再者，“务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句可谓《子虚上林赋》的“赋眼”；“窃慕大王之高义”和“究年岁而不敢忘”则分别是《美人赋》和《长门赋》的“赋眼”等等。这些具有“整体”意义的文句使笔者顿开茅塞，推动着笔者从本质一步步接近司马相如为人、为文的心理动因，从方方面面丰富着对司马相如的了解，走进了他的内心世界，对他有了整体的把握。

然而，这不是我们研究的全部和终极意义。系统论的思维方式还启示我们意识到，包括司马相如研究在内的所有人物研究的意义恐怕在于：

一，人所具有的社会性决定了其作为主体的价值，也必然会成为“社会历史财富”的构成，为后世构建社会价值体系，乃至核心或曰主流价值体系提供历史的观照。尽管这种“社会历史财富”因其价值主体的文化基因有品质、品位、品格之区分，而呈现出不同的品质、品位和品格，甚至有积极与消极、进步与反动、创新与保守等正负之区分，这种必然性仍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而，让研究客体从史籍、书斋、年表、考据文章，以及研究主体——学者们的争论中走出

来，以其活灵活现的本来面目走进接受主体——读者的视野，使读者通过感知、体悟一位位历史人物的灵魂，打开一扇扇了解、透视某一国家、民族，乃至世界和人类文化的窗户，是这种研究客观存在的终极意义。因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社会历史财富”，无疑是全人类“社会历史财富”的子系统，而人物研究无疑又是这个子系统的子系统。所以，接下来的问题自然就是：优化这一子系统的品质、品位、品格是具有全局意义的。如果研究客体是属于某一学科领域内的人物，诸如哲学、历史、文学等等，则不能因为应该重视学科本位的研究而完全否定人物研究中其人研究的必要性和终极意义。从学术研究的基本功和常规看，学科本位乃至所有的人文研究都是需要以“知人论世”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的。

二，其人研究对人、特别是文化名人的品评是否实事求是，对于研究客体作为“社会历史财富”之应然的能否实现，以及实现后的品质、品位和品格的直接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影响的后果绝不仅仅在于给研究客体带来什么，而在于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社会历史财富”带来什么。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本书第二章第三节所评介的有关相如文君婚恋的品评，以及本书附录之一《20 世纪 20 年代至 21 世纪初国内司马相如研究综述》中“司马相如的人格及思想综述”，都给我们的这一思考提供了大量或正或反的证据。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证据又进一步证明了强调研究方法之科学性的至关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物、特别是文化名人之品评是具有历史文化承传性质的人类活动。学术研究作为这一活动的主力军，为这种历史文化承传提供积极健康的资讯，尤其显得重要而迫切。

三，所谓积极健康的资讯，就人文学科的研究而言，主要指研究主体能否揭示研究客体为人类文化永恒的“两难主题”提供了什么。简而言之，所谓人类文化永恒的“两难主题”，就是指不能简单地用是非、好坏、胜负等道德或价值评判来衡量属于人类所共同拥有的、永

无终极结果、必然以悲剧为终极宿命，却始终被彼岸的未知所召唤，而形成的一种生生不息的人类精神。比如蕴涵在中国古代洪水神话中鲧禹父子不畏天帝、前仆后继的文化精神，就是个很简单却能高度概括“两难主题”内涵的例子。至今，人类也没能完全战胜洪水，但是，洪水神话所揭示的人类文化永恒的“两难主题”却是毋庸置疑的。多少年、多少代以后，人类还将仰赖这种文化精神生活。本书对司马相如“原始情结”的阐释、考论，可以说“盖棺论定”了司马相如不是政治家却政治情怀笃定，是文学家，却不是御用文人、文学弄臣的人格本质^①。但是，他的那种把“蔺相如之为为人”的本质特征——以忠义为底蕴的智和勇融入血脉的靈魂^②，在今天到底还有什么意义，是应该完全否定呢？还是应该完全肯定而积极提倡呢？笔者以为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就是一种以简单的是非、好坏、胜负等道德或价值判断，直接给接受主体以结论的研究品格，显然是不足取的。因此笔者在根据文本肯定司马相如“惟君国是忠”的耿耿情怀时，明确指出，我们“并不排除对这一情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然而，正因为如此，才使我们对司马相如这类古代知识分子‘惟君国是忠’的情怀多了一些理解、尊敬和审美景仰，自然会从中汲取更多的积极因素”^③。除此之外，本书对司马相如的诸多研究结果，本质上都是在揭示司马相如面对“两难”之时的所作所为，从中可以看出他为人类文化永恒的“两难主题”提供了什么^④。

司马相如的艺术创造也为人类文化永恒的“两难主题”提供了可供思考的资源。比如他所创造的“虚美”艺术，固然为一个极其严肃的政治话题——“大一统”的政治诉求找到了深入浅出的表达方式，

① 详见本书第二章。

② 此论见本书第二章结语。

③ 见本书第二章第五节序言部分。

④ 详见本书第二章各节的内容。

但后人却可从中看到一个“两难主题”——既要“扬天子之威”，极尽“颂美”，又要戒天子之奢侈，止诸侯之上行下效，防诸侯由攀比到僭越。然而，这在本质上是一个悖论，是封建社会永恒的“两难主题”，岂是相如的一篇鸿文巨制——《子虚上林赋》所能改变的？相如的悲剧自不待言——从人类文化精神上看，这是多少代忧患之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潜意识的不自觉显现；从审美精神上看，本来多蕴藏在叙事文学中的“两难结构”美，竟然出现在人称状物为主的汉大赋作品中。这种“隐藏”在司马相如笔下很可能是不自觉的，因为他生活在崇尚“诗教”说的时代氛围中，他寄托在赋作中明显的政治诉求也说明了这种“不自觉”的可能性。然而，愈是不自觉，就愈能显现出这一“两难主题”之创造撼人的启迪——《子虚上林赋》这看似以歌功颂德为主，表象似乎肤浅的作品，却原来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蕴藏着司马相如不曾感觉到的悲剧美。

“两难结构”的艺术魅力绝不仅仅属于叙事文学，凡成就较高的富有寄托的文学作品都具备。司马相如的汉赋作品可谓篇篇寄托深沉^①。我们只要看一看他驾轻就熟的象征手法就可认定之。他创造的象征手法与汉赋主客问答之体制特征相配合，主要形成了如下特点：一，几乎每篇赋作都有主客双方的化身或曰代言人^②。二，几乎每篇赋作的“主”都是作者的化身或曰代言人。三，比兴手法或明或暗地用于全篇，《美人赋》和《长门赋》是这样，而《子虚上林赋》以“田猎”象征天子的“猎得天下”则是很值得注意的象征。除此之外，或留有余地，或不留余地的对比强烈的夸饰艺术显然亦蕴涵着作者的寄托^③。

如果说本书第一章和第二章对司马相如赋作的创作背景、动机、

① 详见本书第二章第四节和第五节的内容。

② 详见第二章和第三章对《子虚上林赋》《难蜀父老赋》《美人赋》《长门赋》《大人赋》的解读。

③ 详见第二章和第三章对《子虚上林赋》《美人赋》《大人赋》的解读。

主旨和艺术手法有了比较集中的考辨和考论，那么，另辟第三章《司马相如赋考释》，则是希望三章之间相得益彰，为读者搭建一座较为便捷地与司马相如沟通交流的桥梁。

第三章的写作体例是：

一、辑录、考证、校释司马相如赋作所依据的文献及版本都已见于相关赋作的“题解”和本书的“参考文献”，故不再按照惯例在此罗列。

二、所考释的六篇文本完整的赋作按本书第一章所考订的创作系年排序；赋作之残篇及存目者在第一章“结语”部分已经交待。

三、考释由“题解”、“正文”、“校注”、“今译”和“综述”构成。

“题解”主要是简要说明每篇赋作的篇名勘定、篇名含义、创作时间、赋旨及艺术特征，及考释所据的底本、校本。所据底本、校本在该赋作考释中非首次出现时，改用简称。

“正文”一仍底本原貌，有些错误明显的文字即使有版本依据也不作改动，而在注释中说明。如“疆”误作为“彊”等。

“校注”包括“校勘”和“注释”。

凡被校勘的词语，皆于该词后标以逗号。凡径见原书者即称“某书作某”、“某曰某”、“某无”；凡转见某书者均称“某谓某曰某”、“某引某谓某”、“某曰某无”等。以《文选》《古文苑》作校本的，凡称“《文选》作某”、“《古文苑》作某”者，即各版本同，否则分举各版本。今见《文选》五臣本与六臣本中的五臣非同一本。六臣本中的五臣与所见五臣本不同者以“六臣本谓五臣作某”别之。凡异体字，以尊重文本原貌为原则，校勘皆不省略，如“游”与“遊”、“鐘”与“鍾”、“綿（绵）”与“繇”等。校勘中必要的辨析以“按语”形式出示。

凡被注释的词语，皆于该词后标以冒号，以另起一行的方式出现在校勘文字之后。生僻字的注音采用汉语拼音加同音汉字的方法；多音字以加斜线的方法示意。凡在注释中言“同”者，即音义皆同之词，

则不再对被注释的语词注音，如“鵑：同‘岛’”，则不再对“鵑”字注音。非首次出现的语词，根据其生僻程度，或复注音以便于阅读。有些今之常见字，今古音声、韵、调有区别者，亦出注音。凡言“一说”者，大都据古注立“说”。由于汉大赋的文字相对生僻艰深，相同的语词出现在文本中的距离较远时，非首次出现的语词，或根据其生僻程度，以“见注[*]”提示之。同一词语在不同的语句中词义不同，则分别注释。如果一词多义皆无碍赋文文义的贯通，则一并出注释之语。词性相同、意义十分接近的语词，或采用集中注释的方法，因此，这样的注释不完全按照该词语在同一注释号下出现的顺序进行。今之简化字与古字相同，却并非今之简化字者，或出必要的说明，如“涌”非“湧”的简化字；“于”非“於”的简化字等。注释力求详明于简约之中，适当进行词义考辨，说明段落大意，以有助于融会贯通地传达作者及赋文旨意。

“今译”力求浑融完整地传达作品的本意、情感、气势和审美特征，因此，有些不得不加的译文，用加括号的方法示意；有些译文则不严守文本顺序。如“撞千石之鐘，立万石之虞”，被翻译为“立起万石之重的鐘架，撞响千石之重的乐鐘”，以体现赋作的对称美。有些名物，如动、植物的名称，不宜以翻译后的文字出现在“译文”中的，仍以原名称出现在“译文”中。

“综述”一项主要着眼于某些作品的某些问题，既不宜在本书第一章中考辨，又不宜在“题解”中展开，但有辨析、探讨、说明的必要，便除了在“题解”中简要地介绍、说明外，还以文献综述的方式客观地介绍学术界的意见；除了必须说明的问题出以“按语”外，一般不再对相关的学术探讨进行评述。本书“案”字示以他人按语；“按”字示以本撰著者的按语。

在不影响文义的前提下，本书为方便当代读者阅读而采用简体字横排，但人名和某些地名，以及出于下列需要者——尊重文本用字的